



左图为小校经阁今貌，上图为刘体智。

◀ (上接 13 版)

忌倾轧，纷纷到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跟前告状，说其扰乱市场秩序。其时宋子文正筹备发行“航空奖券”，生怕刘体智的“特别有奖储蓄”抢了他的生意，于是略施小计，下令对中实银行这项业务予以停牌。法币政策实施后，宋子文再祭整肃金融市场的大旗，像中实银行这样的民办商业银行，只好接受改组，加入官股，政府还委派原中央银行国库局长担任中实银行总经理，这无疑架空了刘体智的权力。刘体智被时局“摆了一道”，心灰意懒，索性辞了银行高管职务，一头钻进小校经阁里。

刘体智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，开启了一个“惊天计划”，欲以一己之力，创制中国第八部《四库全书》。众所周知，乾隆皇帝时编制的《四库全书》，共有七部抄本，由纪晓岚领衔主编，存放在各地藏书楼里，以规模庞大、版本精美著称，但其中不少属“存目”之书而无原书，并且有些内容被删改，刘体智立志要把《四库全书》所有书目搜罗齐全，恢复其本来面目。为此，他依仗自己从事金融工作积攒的财力和魄力，长年雇用十几名抄书、校书的秀才，成天埋首于故纸堆里，研精极虑，孜孜以求。可惜的是，随着私家产业渐渐坐吃山空，刘体智一度要靠借贷维持生计，这个宏大的梦想无奈付之东流。

捧“银行饭碗”时，刘体智不仅藏书，还喜好收藏文物，尤以龟甲骨片和青铜器见长。民国时期美国传教士“中国通”福开森在《历代吉金目》中记载：“刘体智（晦之）是民国以来收藏青铜器最多的人。”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也说过：“庐江刘体智先生收藏经籍书画金石之富，海内瞩目久矣。”1950年，刘体智将所藏 67873 册古籍，包括 1928 部善本书全部捐赠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，这批藏书分别藏于上海图书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，几年后又将剩余数万

册藏书分批捐出；所藏 28000 余件龟甲骨片则悉数捐给故宫博物院，大批古墨古砚捐给安徽省博物馆。陈毅市长曾颁发嘉奖令，表彰他无私奉献的爱国精神。

身后不留一石一木、一分一毫，这在私家收藏史上，亦属凤毛麟角。晚年的刘体智以善斋老人为号，所辑录的著作有《小校经阁金文拓本》《善斋吉金录》等，既是对其收藏及过眼文物的研究与记载，更是近代最为权威的金石学著作。

陈清华与荀斋

民国年间，古籍善本收藏大家有“南陈北周”之称，北为天津周叔弢，南为上海陈清华。《中国藏书家通典》一书如是描述：陈清华（字澄中），祖籍湖南祁阳，早年在上海定居经商，后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总稽核，其妻为浙江财阀之女。上世纪 30 年代开始收藏中国古籍善本和古碑帖拓本，于古本旧契爱不释手，所藏宋元刻本既精且富，尤以万金购得海内孤本宋版《荀子》闻名于世。

话说宋刻本《荀子》，约刻于南宋光宗绍熙年间，刊刻精美，字大如钱，墨光如漆，版式疏朗，纸张系用宋代黄坛纸，保留着北宋国子监刻书的敦厚古朴之气，闻之书香扑鼻，睹之思绪万千，仿佛身临两宋时期工匠雕版印刷书籍的历史场景中。宋版《荀子》的背后，蕴藏着百折千回、柳暗花明的流传经历，从刻本所钤的印章不难看出，从“邹氏子之”、“邹印同心”、“忠公后裔”、“道乡书院”、“勤有堂读书处”、“甲子丙寅韩德钧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”等，一直辗转落入银行家陈清华的手里，其间饱经的忧患沧桑，难以一言道尽。当时著名版本目录学家、故宫图书馆馆长傅增湘获知后笑问：“君非以万金得熙宁《荀子》者乎？是可以荀名其斋矣。”故此，陈氏书

屋取名“荀斋”。

原来如此！陈清华久居银行高位要职，又系江浙财阀叶琢堂的乘龙快婿，难怪他能一掷万金收买善本，得“南陈北周”之誉。

陈清华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，受教于薛仙舟先生，1915 年在薛先生的帮助下赴美留学，获得伯克利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。回国后他先后就职多家银行，操弄算盘账册之余，醉心于古籍收藏，除了《荀子》为其镇库之宝外，还藏有宋版《韩昌黎先生集》40 卷，《柳河东先生集》40 卷，元陈仁子刻《梦溪笔谈》，明成化五年刻本《铁崖先生古乐府》等，均为世间绝无仅有之物，其藏书之精，质量之高，于江南无有匹敌者。抗战爆发后，陈清华辞去银行“金饭碗”，转入学校教授经济思想史，1949 年移居香港，并带走了数十种珍善之本。

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，陈清华因家道中落，手头拮据，打算出让一部分古籍，美国、日本以



叶景葵

及一些私人藏书家闻讯后纷纷抛出橄榄枝。为了避免国宝级文物流入境外，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向周恩来总理发去请示报告，准备斥资向其征集。周恩来非常关心此事，尽管时逢新中国刚刚成立，百废待兴，白手起家，经济上捉襟见肘，但还是拨出巨款 80 万元，分两次从香港收购包括“无价之宝”宋版《荀子》在内的 100 余部精本，据说这笔花费相当

于那时全国大学生一年的伙食费，足见政府对拯救善本古籍的重视程度。作家黄裳在《荀斋小记》中写道：“陈清华两次卖书，使国之瑰宝不流入域外，爱国之心，世所共仰。”如今，这批善本精品藏于国家图书馆，藏书印“陈印清华”、“荀斋”、“祁阳陈澄中藏书记”、“陈澄中收藏印”等清晰可见。

陈氏的收藏路数，甚是另类，他的“收藏经”很有见地，即家有藏品不能超过 100 件，超过这个数量就会成为包袱和累赘，经常为之牵肠挂肚，寝食难宁。所以，他的藏书倘若逾 100 件，收进 1 件必须卖掉 1 件，吐故纳新，精益求精，始终遵循这一“数量守恒定律”。

叶景葵与卷庵

长期与金钱打交道的叶景葵，也是个书香银行家。叶景葵（字稼初）出生于官宦世家，他 20 岁中举人，29 岁中进士，34 岁担任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总经理，之后他奉旨署理天津造币厂监督，位子还没坐热，又空降大清银行任监督，主张大清银行向中央银行转轨，专以“维持币制，活动金融”为己任。叶景葵与浙江兴业银行渊源颇久，1915 年被推选为董事长。上任后，他革故鼎新，稳中求进，浙兴银行市场份额长年稳居私营银行之首，进入全盛时期。

叶景葵笃志藏书，源于

蓄，藏书 2800 多部，计 3 万余册，稿本、抄本 600 余部，严可均辑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底本，惠栋《周易本义辩证》手稿，钱大昕《演易》手稿，周雪客《南唐书笺注》抄本等，皆为书之瑰宝。其中最珍贵的稿本，当数从杭州抱经堂购得的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手稿。叶景葵刚拿到这部被书虫蛀过的“世间孤本”时，可谓一堆故纸，碎烂不堪，为此，他“灯下排目整理，剔除蠹鱼蛀虫不下数百”，并请修书高手修补，费时两年，使濒于毁灭的珍品重见天日。

目睹江浙藏书大量散佚，叶景葵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感言：“弟因鉴于古籍沦亡，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，政潮暗淡，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，私人更无论矣。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。”1939 年，叶景葵邀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志同道合者，筹设私立合众图书馆。图书馆创建之初，叶景葵做了几桩事：一是确定发起人，成立图书馆理事会，建章立制，构筑框架；二是购下租界中心地块二亩作为馆舍建筑之地；三是捐款 10 万元，加募财产 10 万元，共计 20 万元作为日常经费，动息不动本，又将私家书斋“卷庵”全部藏书捐出，成为图书馆首批馆藏。1941 年长乐路新馆舍落成，当时朋辈响应，捐书日众，至 1949 年合众图书馆藏书已达 30 万卷，建国后更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，今归于上海图书馆。

叶景葵的书斋取名“卷庵”，他生前出版的数本著作均



合众图书馆

1917 年藏书家吴昌绶嫁女时挑出所藏 40 种明刊及旧抄善本，标价千元求售，充当嫁资，叶景葵听闻后慷慨出手，从此引发数十年搜集与整理古籍善本之“癖”。叶景葵所藏，并未停留在秘籍珍玩之层面，而是独辟蹊径，以名家稿本、抄本及批校书为搜罗对象，每得异书，必梳理考订，经他手校古书数百种，圈内获“手稿收藏家”之誉。数十年苦心经营，叶氏倾其积

不舍“卷庵”情结：《杭州叶氏卷庵卷庵目录》《卷庵书跋》《卷庵杂著》等。捧读其《卷庵书跋》，多为藏书跋语，或提擷英华，或评议体例，或考订版本，或叙述往事，内涵丰富，见解独到，令后学者获益匪浅。叶氏还常以“书寄生”自居，曾幽默地对人讲：“昔日我为主而书为客，今书为馆所有，地亦馆所有，我租